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毡乡说荟

——陶克涛文集

陶克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毡乡说荟

——陶克涛文集

陶克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毡乡说荟:陶克涛文集/陶克涛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4899-2

I. ①毡… II. ①陶… III. ①内蒙古-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1007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毡乡说荟

——陶克涛文集

著 者 / 陶克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魏小薇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许 力

责任校对 / 胡锦华 季武西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899-2

定 价 / 98.00 元

印 张 / 28

字 数 / 478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一部著作面世，当今的常例是书前自序，就书中节略或著者简况，向世人作个“广告”，以清眉目，庶几读作两便。可见这序对书是有些用处的。

序，自然被认为是一种“文体”，那么，写法应有规矩。可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如何写法，常见的却有不同，且每藏玄机。鲁迅先生有《序的解放》，深揭当年作序的种种手法；清人郑板桥“难得糊涂”，轻蔑作序，说“何以叙为”。两位先哲的卓识，都从经验得来，实在可以当作序之警示看。我自己向来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很随俗。加上年纪老迈，安于守默，实在没有更多自扰扰人的顾虑，在这里，也就只能按照本身的思绪，信笔驰骋。汗漫以言，且当作书的前言吧。

我生长在被称为“朔漠”的地方，远在毡乡。那里朴野少文，俗尚安常。可我竟有幸在一位“笔帖式”的督导下，多少也接触过一些汉文老书。其实《经》也，《传》也，无非朗朗诵“念”而已，难说理解。后到城市，就学“学堂”，从此眼界大开，读书的领域也就不限了。日寇侵略，抗日军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语）我投笔请缨，毅然穿上军装，进击于长城内外。那些“老书”们，从此也就从思想中被处理掉了。20世纪30年代末，我从战地调到革命圣地——延安，非常兴奋。那里的革命气氛、学习热潮，真是身所未见。在战争时期，能有此次学习机会，岂易再得？所以我狠抓时间，“一心只读马列书”。韩愈说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有点近似。专心一意，绝不旁骛，完全适应了当时教条主义的学风。1941年，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后收入《毛泽东选集》）一文，号召在学习理论、学习现状的同时，学习历史。他批评说：“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

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第二年，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他更指示废除教条主义。至此，“改造”的警钟已经敲起。延安的学习新风很快进入高潮。

我当然远不是什么“学者”，无非一介在学的革命青年而已。但是主席的批评，不啻是对我的一声大喝，着实的鞭笞，须知我就是那个“一点不懂”群中的一个。慌愧之至。从那以后，我力改自己的学习，在学习马列的同时，加劲学习历史，特别是蒙古史。学习所师，全由自涉。两年之间，学习既多，“一点不懂”的局面，渐渐地有了些许改变，学习的兴趣也在加浓，并且意识到先前“念”过的那些老东西，还未必是应当抛弃的一堆敝屣。但是，时局与条件的限制，在总体上所学毕竟依然是两个字：浮浅。

十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学历史的条件更加充裕。虽然一直在理论战线工作，不属学术领域，但我对于历史，特别是毡乡的历史，对于“自己的祖宗”，更多兴趣，更多着意，更加不敢“忘记”了。我在工作之余，不但追求这方面的史料（首先是民族文字史料），考察历史记录的真相，质疑其中的伪饰，而且也摸索毡乡历史人事的得失、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毡乡文化的兴衰。企望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启示未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这种学习历程，大都能在我曾经发表和未曾发表的文稿中找到相应的反映。这里所荟集的文章，是其中的一部分。有打油诗一首：

原是毡乡一野夫，干戈舞罢学翻书。
韦编三绝功何在，信信疑疑心独主。

这就是自己学史的开始与感受。见笑了。

二

本书并不是专题的论著，实际上是一部讨论毡乡诸多故事的文集，是本毡乡“说荟”。它的主要论旨，一是辩证毡乡诸名物、事情的真伪与是非，以补史书间有之不足；二是借此试谈自己的设想和判断，以供大家参考。二者相辅相成，而不论何者，所谈都不主故常、不甘苟同、自抒己见、别创新说。当然，也是探索性的、请教性的。

“毡乡”可以说是一个地区或方域的诂称。它初见于宋人辛弃疾词，但似乎也是演绎而来。在它之前，有汉人细君唱词：“吾家嫁我于天一方，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其后，《北史·突厥传》又记：“穹庐毡墙，随逐水草；食肉饮酪，衣以裘褐。”两者都提到了“毡墙”。以毛制毡，张毡成墙，很见“一方”新奇。用“毡墙”构筑穹庐，组建帐幕，以为人们的居处之所，成一家的炊灶之户，很具特色。这种居屋，易分易合，轻巧简便，既适于居民的依时迁移，也利于畜群的游动管理。这些毡庐或聚或散，或行或居，星落于广阔的草原之上，自然形成一种特异的原野景观，喻之为“毡乡”，甚是贴切。“乡”之为字，在汉文中不就有居于野外之义吗？毡乡食肉、饮酪、衣裘（带毛的皮长袍）、穿褐（粗毛线编织的半长衣）、随逐水草，明显地就是牧业地区、游牧社会的写照。这种图像，虽说的是突厥时代，然而在它之前和之后，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毡乡”云云，实在指的是北方古代游牧世界、北方民族社会，是词家的文学构想、形象隐喻。

“毡乡”的幅域很大。北起贝加尔湖一线，南至阴山两麓都属之。西方的学者称之为“亚洲腹地”，汉文典籍则喻为墙（长城）外、塞外或边外。居于这一区域的人众，则一律被称作“北蛮”“北狄”。在口语上，这个“蛮”或者是北方某族的一种略称，而在文字上特为写成“蛮”字，却不切实且寓诋义了。

“毡乡”是一方不同的领域。清人王夫之有个“夷”“狄”的界说：“裔夷者，如衣之裔垂于边幅，而因山阻阻漠以自立，地形之异，即天气之分，为其性情所使便，即其生理之所存。”^①“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②王夫之被定为明末清初进步史家、思想家，他倡导的“戎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很是著名。他这里说的虽不在点子上，而承认“毡乡”之不同，之“异”，却是高明的。

毡乡这个北狄异域的“北蛮”云云，应当是个概称，在它之内其实包括不同时代（期）、不同称号的种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荤育大概是最早见诸文字（首先是汉文）的族体，那大致在公元前十几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夏商时代，而它实际的存在应当尚在此前很久。从它以后，相依和相继的族体在

①（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第939页。

②（清）王夫之：《读通鉴论》，第976页。

这里陆陆续续建立起多个震惊世界的国体，被汉文史书命之为“行国”“引弓之国”。匈奴人自称“百蛮大国”（当是百族、百国大国）；郁久闾族建国，称“柔然”汗国；蒙古兴起，建号“达延”汗国。但是，不论何等称号，应该承认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毡乡文化的建造者，都是毡乡历史的缔结者和维护者，都是毡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开拓者与发展者，是毡乡文明的捍卫者。正是经过众多的族体和它们的领袖人物的奋斗，才使“行国”与“居国”，在内外交征、兴亡继绝中，并耀于地球而长达数千年之久，“各生其所生，养其所养，君长其君长，部落其部落”。

自然，与任何地区和民族、社会一样，“毡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也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屡经变迁，屡遭厄运。因而它也有悲惨的历史，堕落及至衰亡的历史。我在那里工作过，切身感受过，而这正有很深切的教训需要总结。然而，在人们的意识和感情上，却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点，这值得领会与研究。

“毡乡”这个“自己的祖宗”的历史，需要很好地学习和研究，特别是“祖宗”的后代们要起而研究和学，不要再“对不起，忘记了”。明末顾亭林举例说：“《元史》……舛谬特多。……然此汉人作蒙古人传，今日汉人作汉人传，定不至此。”（《顾亭林诗文集》）此见毡乡人研究毡乡事，自有优势。毡乡的学术领域广阔，蓄积深厚，大有学者们回旋的空间，别族的文献和研究经验、前辈的成就也都可利用。新中国为这种学习与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条件。我发现近六十年来，涌现了不少新的毡乡文化学者，并且在党和国家的扶助下，卓有成就。青胜于蓝啊！

我长期离开毡乡，也始终没有跻身于专业的研究行列。但是，这方面的学习与探索，我始终也没有懈怠过，甚且敢于放胆尝试着写过和发表过一点不自藏拙的论著。不论如何，它们在推动毡乡学术活动中，客观上或者被认为多少起过一时的有益作用。当然，这是极其微薄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全翻了。我被当作“走资派”的“要犯”，横遭大张旗鼓的批判、斗争、捆绑、抄家，坐牢，停止工作，被克扣工资，日夜服役，殃及亲属。无所不用其极。那种疯狂残酷，延安整风审干时也不曾有过，而“罪状”，就只是我发表的革命论著。清人傅青主曾在他的《霜红龛杂记》中说：“险莫险于谈论，危莫危于弄笔。”这是有所经验的沉痛之言。我以前不曾重视这个耸听的“危言”。我被打倒，想起了他的告诫，真是“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复何言哉！然而，我毕竟不敢服帖。我写

下了批判江青的谰言的札记，待时而发。如天开日见，假我年月，我还是要我行我素：革命“谈论”，正义“弄笔”，霜红龛的话，非所计了。然而磨难十年，余悸恐怕还是难消啊！

“四人帮”覆灭，南风解愠。很是高兴。改革开放政策推进，形势大变，政通人和，百业竞兴。我恢复工作后，亲身体会到党的新路线、新政策及新作风的伟大，非常兴奋，极欲投身到新的形势中，贡献自己的一点绵力。有七绝一首，中有句云：“满身鞭痕遗余痛，逢春应须更力耕”。这是真话。既调入科学研究机构，就想能在民族研究学田里耕耘出一垅庄苗。然而，年岁不饶人。不几年，按国家规定，告别岗位，拱手赋闲了。晋人潘岳失职后，有《闲居赋》，说“终优游以养拙”，革命老人自然不能作这样的赋。所以，在力行能及时，我依然应邀、应选、应聘、应约，积极参与毡乡多种学术活动，在向大家学习的同时，尽可能贡献自己的绵力，以成人之美业，并且自属文稿。

随着日月的推移，即使这点作用也起不动了。“年颜渐老空多病，志气无成两鬓残”，这就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变化，“甚矣，吾衰也”。从此，除频繁地出入医院，偶尔在家人的扶持下，策杖园林，消散一点烟霞痼癖之外，就开始谢绝迎送，安分守己，只蜷伏在自家的蜗楼内，以卧游自遣了。一屏电视，气象万千；四壁图书，不啻老友聚会。心情是恬静的。而也就在这里，心不任闲，在这些“老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勉力整理和重写多年来，特别是脱离工作以来，尘封于案下的论稿，以答谢历年来老战友和毡乡学人的眷勉和敦促，偿还一点学术欠债。这结果之一，就是收在本书内的26篇文章。

三

26篇文字各有主题，互不通贯，写作时间先后不一，文体也或参差。但论旨总则当无大异，连类相及，权分六卷。

第一卷是我参与大型方志《土默特志》编纂时，对一些地方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疑问的奉告，这里的几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部分。

历来认定“土默特”即“秃马惕”，“包头”即蒙古语“鹿”的音译，“板升”即“土屋”“房子”的意思。众口喁然，几成定讞，甚且以之刊诸辞典、地图，导引学界，有混淆史实之嫌。而论据却是一知半解，人云亦云，志书不宜依违其说，应须核校。本文所述，允为导议的第一笔。

“把什”亦作“把格什”，以之名村者，不止一处，而本书所述“把什”，实为古敕勒川中最著名者。这个村庄人多，地大，民族分野大，很具民族聚落的典型性，“土默特”部的历史之光，往往在这个村里找到折射。修好这个村的村史、村志，对本地其他村庄的史、志的撰写，可能有示范的意义。《把什村史》不为成功之作，本文因此发出如何修村史、村志的呼声，亦为前人所未道。

第二卷是讨论青海诸事的文章。

青海地方民族不一，牧区面积占全省一半以上，亦可视为“毡乡”一类。我同意去这个“毡乡”作学术的目的，是调查“青海土默特部”。蒙古土默特是边外的大部。“九边”中辽蓟以西，宣、大、榆林等镇所面临的战争与交涉，主要的是达延汗国的右翼三部，尤其是“土默特”这个部。《明史·鞑靼传》的传主，重要的也是三部中的这个部。“青海土默特”正是这个部的分支。这个分支在这个地区活动半个世纪，影响巨大，而它的历史成败、进退真相，却甚少（几乎没有）记载。调查研究取得进展，应能补充土默特史之空白，极具学术价值。然而我的追求，意外地没有收获，却际会风云滞留在这里二十年。

我在青海工作的二十年是困难纷扰的二十年。起先是三年灾荒，城乡饿肚子，接着三年“四清”，大启阶级斗争，紧跟着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粉碎后，却是两年之久的“两个凡是”。在这种局面下，很难正常工作。我的研究工作认真说，只是在饥荒三年间。这期间，在学术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调查青海土默特无法进行之余，退而试探土族渊源。“土族”是新称，旧称“土人”。《西宁府志》不载，只述当地土司。新中国建立，“土人”被认定为“土族”。“土人”被世人注意，可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的记述相继出现。然而，其于“土人”的历史渊源却甚少涉及或歧说各见。土族人自称“察罕蒙古儿”，意即“白蒙古”。《明史》译“蒙古”为“鞑靼”，以此匡之，则“白蒙古”当即“白鞑靼”。而汉文史籍往往指阴山一线及甘肃地区的汪古人为“白鞑靼”，而“汪古”只是外称，它自是克烈部土默特。所以，土族应当是土默特人，本书即准此而言。这是前人未及而至今也不见有人及之的。这是我五十年前的见解，而今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却异说纷呈，不一而足了。年纪衰朽，均已难以逐一究诂。而青海土默特部的调查，迄无所获，仍自歉仄。

另一工作即地方文艺（民间文艺）的普查。我因兼职青海文联的工作，

以为创建与发展地方文艺，应首先对地方民间文艺彻底了解，寻找其特点、规律，重点是史诗《格萨尔》及民歌“花儿”。这是一次规模宏大、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虽然当时生活条件普遍艰难，可收获极大。

《格萨尔》原文版本收集之丰，可称全国之冠，并全部予以汉译。《格萨尔——霍岭大战》汉藏文本正式出版后，极具影响。我为该书写的序言是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的专文，为中外谈《格萨尔》者中的首创，已收入该书。收入本书中的《〈格萨尔〉谈话录》，主要强调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的巨大作用，肯定“巫”与“钵”的重要以及本族固有宗教与外来宗教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英雄格萨尔可能正是本族固有宗教的化身。此说亦属首创，自然也是可商量的。

“花儿”这种民歌形式遍及青海地方，各族人民喜闻乐见。如何突破旧的框架，给其以新的生命，我曾以为还是要溯源。既然这里的汉民普遍认为来自“南京朱家巷”，那就调查其祖源地，以找到这种民歌流行的最初渠道。我的文章就是一种尝试。

《“靠边”札记》是“文革”中，就一份江青在她的写作班子上的讲话油印稿所作的批判。这是对她的蔑视与愤怒，自然，当时是不能发表的。它表明：尽管淫威逞于一时，而匹夫之正气却不可移。

第三卷是应邀参加韩亦刺惕学术会议期间的学术记录。

《准噶尔地纪行》一文主要说了三个观点：地方风物观，学术会议观，韩亦刺惕历史观。三“观”其实都从三“学”而来：向地方学习，向会议学习和向韩亦刺惕人民学习。因为是这样的“三学”，所以文中对于历来“御”制官书及仰此聒噪的成说，不免有所隔膜而另作定夺。

第四卷专谈“毡乡”民族民间古歌。

这些民歌不是一般市井艳歌、里巷情曲，无论歌词、内涵，都很严肃，而情调则颇哀婉，令人惊奇。《韩诗外传》以史证《诗》，近代学者亦有以诗证史的创作，而以毡乡古歌试探毡乡古史的脉络，则是本卷的主旨。此种试笔实亦前所未见。所叙三歌，虽见于汉文的时间不一，但都发生在阴山麓地，完全一致，这也是在《土默特志》编撰过程中，引起我兴趣的所在。或者它们应当被看作当地民间文征而入录于档内的吧！

第五卷各文基本上属于随笔性论述。

有关《蒙古秘史》诸问题，为历年学习中所遇，都有针对性。以桐城派诸家论文体的阳刚阴柔之说，搬套以评论《蒙古秘史》的文学品格，我认为

不适宜。关于《蒙古秘史》的撰者、成书时间，也都不拘诸成说而自立主见。《蒙古秘史》已成一学，博大精深，研究者很多，一人蠡测，不必就是定论。

1953年，成吉思汗陵寝从甘肃迁回伊金霍洛。适值成陵大祭，当地借此举办贸易大会，声势不小。而如何看待这位历史人物，众人褒贬各异。《关于成吉思汗》一文即写于此时，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负责人间内部传阅过打印稿。

李鼎铭先生撰蒙古史纲，初见之，甚为惊奇，也感慨系之。《李鼎铭先生〈蒙古历史教科书〉读后》一文，正是出于崇敬并深致悼念而属稿，并借以抒发陋见。

第六卷所说，有不属毡乡地方者。

《国立北平蒙藏专科学校地址探索》一文，专讲蒙藏专科学校校址。学校原址被定为文物单位，而其具体原委，不见有前人系统记述。我曾在此就学，后又长校，向有历史情缘，故表而出之，以为后人撰述提供一点线索。

皂君庙事，记者轻信伪碑，报道忒误，《“皂君庙”疑》一文则指出“灶神”无“庙”，“灶”不与“皂”同。至今这里仍是皂君里、皂君路、皂君站，绝不写同音的“灶”。皂君庙建于金代，乃是河神之庙，并供有元廷北安王座，与民族（女真、蒙古）有点关系。崇文门外灶君庙是盐户专业庙，是盐神之庙，与一般“灶君”迥异。因“灶”“皂”而牵出北平风俗、义地、宫禁、阉人、皇家辇路等一系列史事，就我所见，实为前人所未发。

六卷内容，略为撮述至此。

本书所荟各文的撰写，在时间上跨度很大。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写的，有的则写于2010年，大部分写于“文化大革命”后，而离休后在文字上重作整理的。为保持历史原貌，内容无变动，除少数几篇外，绝大部分没有发表过。因为以前曾著有《毡乡春秋》一书（包括匈奴篇、柔然篇、拓跋篇等三部），情结所致，是以不避因袭，本书亦冠以“毡乡”二字。那么，就把它当作《毡乡春秋》的余墨，它的尾缀吧！

四

综观全书，既不是毡乡通论或通史，也与毡乡的各种专史无缘，它所斤斤于笔墨者，多是毡乡文化的细事末节，似乎无足轻重。这话也不无道理。

不过，我既非学界“里手”，又或孤陋寡闻，舍此“细事”不谈，也觉可惜。其实，自来史家不忽细节。不要说有好多专谈“细事”的书文，历叙闲事的稗文，就是一些堂皇正史，不也有不少注家吗？裴骃注《史记》，应劭注《汉书》，胡三省注《通鉴》，所注也都是“细事”“细物”，而它之于正史的确切了解，却很见裨益，并备受称誉。不宁唯是，注而疏，疏而表本，也比比多见。清人崔述甚至说：“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僨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僨事者。”（《考信录》）“僨事”即坏事、败事、害事。他把过问细事，说得这么严重，我是心仪的。本书各文正是由此出发而说之。所以“细事”往往反而是大事，或者说是成就大事的必不可少的构件。如果这些“构件”有问题，有罅漏，那宏伟建筑赖以矗立，势必隐患。信不信？

我在探究诸问题时，前已说过，不主故常，既无窠臼，也无绳墨；既不宗仰什么学派，也不法随哪个山斗，纯粹就是说事，自披胸襟。所见又不一定恰当，这就不免冒失成说，唐突惯常了。但是，这不是本书的原意。闾闾以说的，只是提倡“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精神。不迷信，不学舌，“勿意，勿必”，把学问治好，对不对？未便自信，敬祈大家教示。

我离休之后，曾经落户在城郊。这里也很繁华，可是它毗邻农田，接目园林。近水，远山。凭楼眺望，每每能想到苏东坡“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的诗句，确是一处宜居之地。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屡发的各种风波，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劫后余生，能觅得乐业安居，亲眼看到国家更加繁荣强盛，亲身体验到革命理想的实现，老而能够潜心学习与研究，感到非常庆幸和感奋。这真是要感谢党和国家的老年政策，深谢热心老年工作的同志。

可惜，不少老战友、老同志中道而殁了。

这本书能印行，致谢赞助的组织和同志。

陶克涛

2012年7月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	---

第一卷

土默特不是“秃马惕”	3
“板升”本义	20
把什板升忆述	34
包头地名释略	45
“鹿”的质疑	62
从一部旧旗志说起	70
《把什村史》阅后	84

第二卷

《格萨尔》谈话录	93
土鞑原叙	116
青海“花儿”原始	140
“靠边”札记	152

第三卷

斡亦剌惕探源五议	177
----------------	-----

准噶尔地纪行	194
--------------	-----

第四卷

《匈奴歌》别议	253
《敕勒歌》述略	264
《老胡歌》说史	281

第五卷

蒙古先代传说试探	291
蒙古以“狼”为图腾质疑	300
《蒙古秘史》设问	311
《蒙古秘史》纪念会追述	322
李鼎铭先生《蒙古历史教科书》读后	343
关于成吉思汗	360

第六卷

《毡乡春秋·匈奴篇》蒙译本序	385
国立北平蒙藏专科学校地址探索	390
“皂君庙”疑	394
也说“胡同”的语源与词义	405

第一卷

土默特不是“秃马惕”

还在四五岁的时候，夏天傍晚，在正房的檐台上，陪奶奶说话。当然，自己只是听话而已。奶奶告诉我：“他们问你是哪儿的人，你就说，‘把克什板升’。”从此，我知道自己出生在这个“把克什板升”。到了五六岁的时候，爷爷教我：“有人问你是哪个‘霍硕’的人，你就说‘土默特霍硕’。”他和奶奶一样，也用蒙古话教我。从此，我又知道自己的祖籍是“土默特”这个地方。爷爷说的“霍硕”（huxigu），主要指地方，即山脚下平地，不是指满洲人所改的那个“旗”的含义。其实，“土默特”也是人的姓，不止是指地方。他们二老说话时的神情、状貌，至今历历在目，也永难忘怀。

因为是在小孩初有记忆力、刚刚懂事的时候的印象，所以这两个“知道”，先入为主，印象特别深刻，终生不忘。它就像两盏明灯，牢牢地挂在自己的心坎上。但是，这两个“知道”，即“把克什板升”和“土默特”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两位老人没有说，我也不懂得问，所以实际上也还是不知道。它又像两个葫芦一样，始终“闷”在我的胸中，久久地没有开释。

年月一天天地过去，自己也随着慢慢地成长，尽可能开释这两个闷葫芦的想法也就越发地翻腾起来。为什么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实际上追究起来，好像还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

第一，这是天性，人之常情，“狐识首丘”，何况是人。谁不想知道自己家乡的由来，谁大概也不想让人说是忘祖宗、忘血统、忘姓氏、忘乡土的人。春秋时代，晋国有个大夫，名叫籍谈。他祖辈以来，就专管国家的典籍。然而他却对周景王的问话回答不上，景王说他是数典忘祖，并悲叹说：“籍父其无后乎？”就是说，籍氏的香火恐怕没人继承了。绝子绝孙，那还了得？忘祖是严重的事。这当然说的是封建时代。我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趋向正是反封建的。然而“忘祖”，“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语），不